



Beijing Daxue Bijiao Wenzue Xueshu Wenku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李华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教育部211学术科研项目

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李华川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李华川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

ISBN 7-301-07001-2

I. 晚… II. 李… III. ①陈季同(1852~1907) - 生平事迹
②东西文化-文化交流 - 中国 - 清代 IV. ①K827 = 52 ②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568 号

书 名: 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

著作责任者: 李华川 著

责任编辑: 李 颖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001-2/G · 10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75 印张 23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是近数十年来以北京大学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集成,它是这个学术群体数十年来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中所积累的对于这一学术的理解和从事的学术实践,现在以“系列书系”的形式公刊于世。

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复兴以来,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路程。如果从学术层面上考察,可以说出现了三代主峰。以朱光潜、黄药眠、杨周翰、李健吾、钱钟书、季羨林、金克木、李赋宁、周珏良、陈嘉、范存仲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文革”之后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第一代学者。以乐黛云、饶芃子、陈惇、钱中文诸先生为代表,他们是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和发展的第二代学者。目前,在跨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第三代学者。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人。在几代主峰中间,也都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的学术桥梁。前一代主峰学者的学术与精神正是经由这些“学术桥梁”传达到了后一代的主峰层面上,承前启后,把学术推向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一致。它的前身“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创建于 1981 年,

由杨周翰教授领衔主其事。这正是第一代学者们致力于复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产物。它被定位于北京大学,或许这正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与新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1985 年,我国教育部批示同意北京大学把“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改建为具有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1993 年,北京大学校长会议依据学术研究的需要,决定将该所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以季羨林教授为顾问,由乐黛云教授为所长。不久,乐黛云教授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理事、副会长。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国联络处的所在单位。这一系列的文化事态,便成为在 80 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经过近十年的复苏准备而进入向其学术峰面跃进的标志。

此后的 20 年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与全国学术同仁共同努力,希望在这个长期被忽视而又对于我国人文科学在世界崛起具有相当意义的学术领域中能够有所作为。尽管研究所的规模不大,教学与科研人员不多,但全所对于学术的忠诚不敢懈怠于片刻。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支持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不仅在国内学术界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在三个层面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

第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我国高等学校比较文学研究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中率先建立起了“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的完整的学位学术体系。国内和国际上对比较文学学术有兴趣的研究者在这里经过严格的、规范的训练,造就成比较文学学术领域中强有力的学者,他们既在国内的学术界,也在欧洲、北美、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广袤的学术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学术作用。与此同时,20 年的人才培养也使我们对于在中国人文环境中如何造就以本民族文化教养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多元文化思维能力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体验愈益深入和深刻,成为不可多得的学术财富。

第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以自己坚韧的学术精神和相对坚实的学术功力,以他们勤勉和聪颖

的智慧,在继承本学术领域内相对稳定和合理的公共成果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精神,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层面。由这一群体所特别提倡并躬身持久实践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形象学”、“叙事学”、“阐述学”、“符号学”和“比较诗学”等学术层面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进展,从而把对“比较文学”的学术认识从它的功能价值与社会作用引向了对学术内奥的研讨,把传统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综合而融为一体,推进了把文本实证与理论阐发相互贯通的多层面的原创性思维,显示了以中国文化为教养的世界多元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和方法论特征。今天,我们可以多少有把握地说,这一群体已经开始具备了捕捉国际学术发展新趋势,回应本领域中相关学术挑战的能力。

第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不仅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而且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学术声誉。其标志有三。一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已经在本领域中建立了高层次的多项目的国际学术合作,其学术成果为学术界所认定,其中有获得国际(政府间)组织所授予的“学术类金奖”的荣誉,且目前仍然继续着这样的国际学术合作。二是本学术群体的成员,全部在研究对象国有过“学位留学”、“学术讲学”和“研修养成”等广泛的学术文化体验。其中有些先生的学术信念和学术观点为相应的对象国学术界所重视,在国际同行中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和学术声望。他们的著作被指定为大学研究生的“必读书”;他们在国外学术会议中,经常作为“基调报告”和“主题讲演”者出现,从而开始实现以“自我学术”为基点融入并推进国际学术发展的“全球学术”势态。在这一过程中,相应展示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某些风采特征。三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员,先后并长期承担着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组织的负责工作。除乐黛云教授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外,孟华教授长期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严绍澍教授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研究委员会(CEAS)主席,并先后担任在日本大阪成立的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常设)副会长、会长等。由此而使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有可

能实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运作,并相应地表达中国学者的声音。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数十年来随着祖国在世界的崛起,在丰富多彩的人文学学术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取得了这些微薄的业绩。正当研究所准备回顾自己的学术踪迹,结集自己的心得之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课题被纳入北京大学“211”学术规划之中,经我国教育部专家组审议予以认定,从而得以公刊于世。

本“文库”的内容暂定为两大系统。一是20年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邀请与接纳世界各国学者来本所讲学的同时,本研究所的教授也在世界许多国家有过许多的讲学和讲演。他们使用对象国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沟通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与国际的联系,展现中国和北大学者的学术业绩和人文精神。“文库”对此加以编辑为《海外讲演录》,仍然使用作者当年讲学和讲演时的“对象国”语文出版,以便对他们在世界各地学术界表述的“中国声音”进行“保真”。第一期先行刊出英文版、法文版和日文版三卷,以后还将继续结集公刊;二是这一学术群体成员在多元文化层面中所做的具有学术意义的专门著作。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成果殊丰,但在作为比较文学学术内奥的各个文学与文化层面上则还未见有切实的阐述研究。本研究所致力于推进把文本实证与理论阐发相互贯通的多层面文化的原创性思维,在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阐述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诸多领域,作了探索性的努力,分别撰著为专题研究的论稿。第一期先行刊出四卷,以后将会陆续公刊。

参与“文库”著作的作者大约有三个层面,一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员,二是在本研究所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成员,三是参与本研究所课题研究的特邀成员。

我们希望这一“文库”的刊行,能够把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在一般概念阐述的基础上引向更加深入的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逐步形成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术”。

我们衷心地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在同一学术目标下有着更加广泛和切实的合作,也诚恳地期待在阅读本“文库”过程中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正和提出各种商榷感想。

本研究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本“文库”的出版,特别感谢出版社副总编张文定先生、外语编辑室主任张冰女士与各位编辑的辛勤劳作。

严绍璿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主编

(2004年清明之日撰于北京大学静园六院)



J Cheng Kiatong

前 言

19 世纪 80 年代,法国文化生活中活跃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他频频出入沙龙、舞会、官邸,不时应邀出席名目繁多的展览会、报告会;他操流利法语而做的演讲倾倒了无数法国听众,以他的名字发表的法文著作多次再版,转译,不胫而走;而报刊上更是常见他的“大”名,甚至还以他的大幅照片装帧封面……所有这一切,结构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个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时间竟成了欧洲人心目中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名作家”。更令人惊讶的是,此公所有的文化活动几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向法国及欧洲公众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他的活动是如此的卓有成效,以致在当时法国作家、文人的笔下,人们常可读到对他的转引、转述、介绍或评论。于是他便成了 19 世纪下半叶中法文学、文化关系史上一个无法逾越、无法回避的人物。

他,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陈季同。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留学法国。他曾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官至参赞。1891 年 40 岁上因私债问题被召回国,却仍不甘寂寞,在上海等地介入不少维新活动。他的一生,官位虽不谓高,著述虽不谓丰,却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欧

早期外交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在诸多方面都拔了头筹,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活跃的“弄潮儿”,因而在偏重“总体史、精神史、心态史”的当代史学研究中,渐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都对他做过介绍与研究,内容涉及陈氏在中国近代外交、内政、文化诸方面的功过得失,其中既有史料的发现,亦不乏真知灼见,很给人些启迪。可惜此类文章均为散篇,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整地处理这样一位处于中西交汇处复杂而多面的人物。

李华川所著《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恰恰从一个方面——文化的层面——弥补了此一缺憾。本书原系作者的博士论文,是在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大框架中选题、结构的。因此作者开篇虽从史料钩稽入手,考辨了陈氏生平史实中的三桩公案,但全书着墨最多、用力最勤,亦最具原创性之处,则是对陈氏的中、西文著述及其文化活动的全面论述与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季同是第一位以西文著述,并在中、西两个方向上都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播使命的国人,他的双向文化媒介作用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者不仅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分述陈氏在欧洲及在国内的文化活动,且在全书结尾处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陈氏的文化态势及观念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与总结。鉴于陈氏在文化交流上的作为先于辜鸿铭与林语堂,作者高度评价他的文化史地位,将其誉为“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

虽为“先驱”,但遍查各式辞书,却鲜有记载陈氏生平史实者。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相比于“记录”,历史更多的是在“忘却”。对于那些难以归类、多面复杂却又从未占据过显赫地位者,以往的史家们往往会不顾过程,不究缘由,很势利地将他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使之归于沉寂。所幸,自法国年鉴学派对史学学科进行了重大革新后,历史已不再是“重大事件”、“伟大人物”的组合,它同样也公允地承认芸芸众生们在其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历史,一如雅克·勒高夫赞颂伏尔泰的史学著作时所说的那样,“是结构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是有分析、有说明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新史

学》)。而在此种观念指导下进行的研究,也就必然重视过程,重视导致最终结果的所有因素,包括它们各自的原始形态及其合力与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倘以上述原则为参照,我们就不难发现,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新史学的诸多主张,在多个层面上受到了该学派之影响。

首先,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新史学所倾心的“普通人”类型。相比与那些“彪炳千古”的英雄或“遗臭万年”的奸臣,陈季同只是一个“小人物”——清末一个普通的外交官、普通的文化人。但他的举止言行、所作所为,无一不浸润在晚清特有的氛围中,点点滴滴都折射出了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文人的心态;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在中西间穿针引线的文化“中介”,因而更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对这一个案的剖析,可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在中西两个方向上,相异性是如何作用于对方的文化身份,而它们彼此又是如何互为渗透的。

其次,本书在开篇处即鲜明地提出了“陈季同的文化史坐标”问题,希图尽可能地贴近、还原陈氏曾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生平史实置身于社会、历史、人物编织起来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予以考查。这种将时空与政、经、文化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的考察方式,正是总体史研究所倡导的原则之一,而我以为,本书对陈氏生平三桩公案的考辨之所以得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立体”式的研究方法。

这里,自然还涉及了另一年鉴学派的主张——如何看待“史料”?对陈季同这样一位正史不载,辞书不收的小人物,如何搜集资料?又如何使自己的立论“言之凿凿”?在这方面,作者同样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启迪:他悉心搜集了陈季同大量的著作、译作、文章、书信,不放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材料,甚至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正是在对这些以往从不被重视的资料进行的归类、梳理、阅读中,他使陈季同一点点地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变得可触可摸、鲜活生动,终于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要想从历史的尘封中清理出足够还原这样一位“小”人物原貌的资料来,谈何容易?!在

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李华川为搜寻相关资料,往返奔波于北京、上海、巴黎各地的诸多图书馆间,用力之勤,非常人可比。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在巴黎查阅资料时的情形:在法国著名学者巴斯蒂夫人的推荐下,他得以进入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见到那些涉及陈季同生平史实的书信、文件,他如获至宝,每日里俯首其间,乐不思“书”(法国国家图书馆尚有大量待阅的书籍)。每次见他,都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所获所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道酬勤”,对大量中西文献资料的掌握、梳理与考辨,为本书的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当年论文在答辩时就曾因材料扎实而颇获好评,而这,也的确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最后,当然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

通读全书,我们很容易便会发现,作者并不满足于对史料的梳理、陈述,他的重心所在,是探讨陈季同怎样和为何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成为了一个“中介”,一个“这样的”中介。而作者最感兴趣之处,显然是陈季同身上不时表现出来的相左的中西文化观。让我们先来读读以下两段文字,它们分别出自两位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名家”之手。

一位是曾朴。众所周知,曾朴是在陈季同的指导下才得以系统地了解了法国文学的,他因此对陈氏推崇备至,尊称他为自己的“法国文学的导师”。在曾朴笔下,曾有过这样的记述:“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的。他常和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曾先生答书》)。

另一位则是罗曼·罗兰。以下是他的一段日记:“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

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但他又刻意表明了两个民族间实际上是有差异的!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罗曼·罗兰高师日记》)

同一个陈季同,同样是谈论中西文化之差异,为何在曾朴与罗曼·罗兰笔下,所录所感竟如此地南辕北辙?

对此一悖论现象,本书作者既不回避,亦不“存而不论”,而是在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紧扣此题结构文章、展开论述。他在全面介绍陈氏的著述及文化活动之后,以“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分别概括了陈氏面对西人、中士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态势,又在更高的观念层面上探询了表面相悖的这两种态势其内在之逻辑,认为它们实源于陈氏对“世界的文学”与“天下一家”的衷心企盼,是同一理想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公众的不同表述。

我十分认同作者的此一分析。倘若我们把眼光略略放开些,便会发现陈季同对中西文化的悖论式表态,颇能代表清末民初“有识之士”的普遍心态,特别是那些与西方文化正面交锋者。这是在文化转型期、在双重文化的作用下,一个对自身文化身份极度焦虑者的合乎情理的反映。

时间是转瞬即逝的,而心态却是在长时段中积淀下来,并在传统与现实相互纠缠的结构中起长远作用的。对陈季同文化态势的分析,使本书从总体上并未陷入纯史实的描述,而是从现象出发,质疑现象、提出问题,又从对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中,对现象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以为,这是国际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理应遵循的路数。

或许有人会问:分明是一部比较文学论著,为何此处却独独要从新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评述?对此类质疑,我愿坦白交待我的“别有用心”。

李华川是我带出的第一个博士,毕业后即进入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工作。对于这个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小同事,我的确寄予了厚望。他曾从国际文学、文化关系的视角出发,做了一份与史学相交汇的很好的工作。我热切地希望他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曾经接受过

的训练,能助他不沉溺于繁琐的史料考据之中,能提醒他不时从细节中抽身出来,在总体史的宽广视野中思索、比较、探讨问题,把他在陈季同研究中已经把握的诸多方法继承下来,发扬下去,在史学领域再创新绩。

我的另一个意图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贡献。比较文学原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注重向其他学科学习、与其他学科联手,跨学科性是其重要的特质之一。事实上,华川今日能进入史学界,在相当的程度上恰恰印证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反之,也说明了比较文学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空泛而随意。这同样是一种十分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中包括历史研究的训练。它既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理论与方法论修养,更要求他们尊重史实、尊重证据,老老实实在地处理材料,从材料中提炼问题。如若说果真有何不同,那这不同就当在于:它还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外文水平、较宽厚的外国文学文化知识,在跨语言、跨文化的研究视域中足以支撑起他们的命题、立论与阐释。

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本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

陈季同在欧洲生活了16年,他的文化活动及许多思想的生成都与欧洲,特别是与法国19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与当时欧洲人的中国观密不可分;而中国观问题又会牵连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同时期法国汉学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囿于时间与精力,作者迄今尚未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限制了作者的知识场,使其难以对陈氏在欧洲的文化活动及西文著述做更为深入、中肯的论述与分析。

由此看来,对陈季同的研究还远未结束:陈氏两本法文书的著作权问题似仍有可商榷之处,欧洲读者对陈氏西文著述的接受也仍是一个诱人但未加开发的研究领域;若再深入一步,就会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探究:陈氏言行与著作建构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它与欧洲人当时对中国的想象之间是何关系?如何互动?过程?后果?在晚清文化史、心态史的特殊结构中,在19世纪末中西双方文化的交互运作中,陈季同个案的必然性?或然性?特殊性?……

“陈季同”是一座富矿,可以生发出无穷有意义的课题来,而有了本书作为根基,李华川一定不会令我们失望。

我企盼着……

孟 华

2004年7月26日

于北京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陈季同的文化史坐标	1
第一节 中西文化关系史述略	2
第二节 晚清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	6
第三节 陈季同早年的文化经历	11
第二章 三桩公案辨析——陈季同生平史事考	17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中的角色	18
第二节 两部书的著作权	27
第三节 私债问题本末	36
第三章 中国的声音——陈季同在欧洲	45
第一节 欧洲交游述略	46
第二节 法文著作提要	55
第三节 破除偏见的努力	64
第四节 理想化的中国	70
第五节 比较风俗研究	80
第四章 自西徂东——归国之后	91
第一节 洋务与维新	92
第二节 《求是报》研究	105
第三节 法国文学的启蒙师——陈季同与曾朴	117